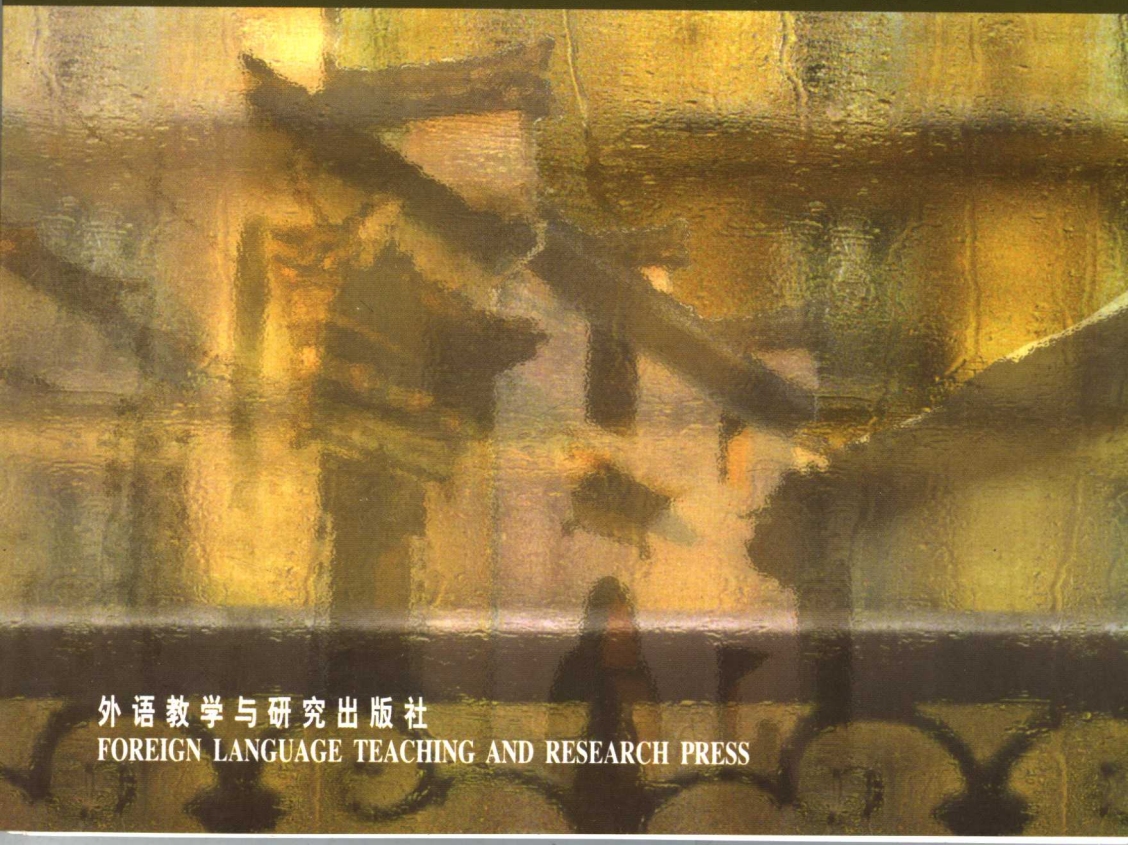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当代文化视域下的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吴格非 ●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当代文化视域下的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吴格非 ●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化视域下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 吴格非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学术文库)

ISBN 7-5600-5523-0

I. 当… II. 吴…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O-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263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项目负责: 孔乃卓

责任编辑: 程 序

执行编辑: 李念璐

封面设计: 蔡 曼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5523-0

定 价: 13.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前 言

近几年来,我一直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中西比较文学的课程。在许多人看来,以目前的学科设置,比较文学从属于中文学科,其课程都是在中文系开设的,因此外文系学生只要选修中文系的比较文学课程就行了,外文系本身无需再开设这门课程。这一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中文专业的研究生熟悉中国文学,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阅读的所谓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翻译过来的译作。笔者认为,翻译过来的作品,其身份已不是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或中国文学,所以他们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外文专业的研究生阅读的都是外文原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虽然不太熟悉中国文学,但是他们具有较为纯粹的西方文化视角。因此,如果说中文研究生更多地以中国文化视角解读西方文学的话,那么外文研究生则凭借西方文化视角去审视中国文学。所以,中文系和外文系是以两种不同的话语立场去研究比较文学的,它们都有各自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学本来已早趋边缘化,但是,随着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比较文学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研究,而是文化研究,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对话和融合的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实际上是世界文化的载体和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就是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比照之下对中西两种文学现象或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一研究是双向互动的,任何基于一种视角的研究难免失之偏颇。客观地说,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从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主观上,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二元共存而非二元对立的态度。当我们同时站在中西文化两个不同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思维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界限和关系问

题,这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有意的或无意的误读,以及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具有语义对等的功能,所以,笔者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当它被译成另一国文字后,在语言风格上,其实已是彼文而非此文了。举个例子,许多人都阅读过一些著名诗人翻译的英美诗歌,笔者在课堂教学中,曾把多位中国译者翻译的同一首英美诗歌进行对比,通过对比研究,学生们感到,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用耶鲁大学米勒教授(Joseph Hillis Miller)在表达解构主义含义时的一个词语来形容比较合适,这个词语就是“parasitical”^①,意思是“寄居的”。译者用外国人的名字和题目,却以极富个性化的语言,说自己想要说的话,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情绪。试对比以下五位译者翻译的拜伦《哀希腊》诗的第一节: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火热的萨弗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
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查良铮 译)

希腊群岛呵,希腊群岛!
你有过萨福歌唱爱情,
你有过隆盛的武功文教,

^①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太阳神从你的提洛岛诞生！
 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
 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杨德豫 译）

希腊群岛啊，希腊群岛！
 从前有火热的萨福唱情歌，
 从前长文治武功的花草，
 涌出过德罗斯，跳出过阿普罗
 夏天来镀金，还长久灿烂——
 除了太阳，什么都落了山！（卞之琳 译）

惟希腊之群岛兮，其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唯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胡适 译）

巍巍希腊都 生长奢侈好
 情文何斐亶 茶辐思灵保
 征伐和亲策 陵夷不自保
 长夏尚滔滔 颓阳照空岛（苏曼殊 译）

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不同译者的译文语言风格的差异何其之大，而每个译者的语言风格和原诗的差异也何其之大。所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从某种角度说，它（译文——笔者注）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新的历史。”^① 德里达认为译本是一部不同于原著的新书，这意味着，被翻译成另一国语言的外国文学著作，在目的语国家已经失去了外国文学的身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份。在中国,我们可以说,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不能被称为外国文学作品。

如果译文不能被称为外国文学作品,那么也就不能叫作翻译文学了,因为翻译文学是个似是而非的名词。在我国,它的最确切的解释也许是“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该名词的不适用之处在于,既然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不能被称为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怎么会有“被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存在呢?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翻译文学是一个悬浮着的、没有身份的概念。任何作品都必须被赋予一定的语言文化身份,而我们很难给翻译文学赋予这种身份。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在几年前便提出了“被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究竟是算外国文学,还是算中国文学?”^①的疑问。笔者的观点是,被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是中国文学,而如何使文学翻译逐步走向中国文学,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再者,关于中外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强调“东学西渐”之潮渐成我国学术主流。这样做有利于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但过分强调“东学西渐”而忽略“西学东渐”的研究,是文化民族主义激进化的表现,不符合中国文化包容大度的雅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西学东渐”的历史意义和其之于中国未来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参照。西方文学与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近代以来,没有外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浸淫,就没有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创作也不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局面。事实上,无论对于哪一个民族,只有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正确接受外来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才会不断进步和持续发展。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造就了其宽广包容的胸怀。任何外来文化一旦登陆中国,必然经历一个被移植、模仿、借鉴、利用、改造和本土化变异的过程,最终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根本形态不发生变化,只会愈发健康

^① 这是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大连举行的一次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提出的。转引自莫言《翻译家功德无量》一文,见2003年3月号《世界文学》杂志。

壮大起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考察和研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一影响研究进行得愈深,对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愈有利,愈能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以,笔者认为,基于本土文化立场的接受和影响研究仍需加强,关键是要开展深入的研究,以真正熔炼中西文化于一炉,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比较文学界注重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于文化共同性的研究。西方文化与我们相反,它更注重对于“共同意识”的探讨。美国当代学者萨莫瓦(Larry Samovar)认为,不同文化交往的基本原则是求同存异,即一方面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语言代码,培养移情,同时学会文化适应,对文化差异表示宽容。^①我们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努力寻求中西方文化的共同语言、共同情感和相互适应性、宽容性。只有这样,中西文化之间才能建立积极有效的对话机制,双方才有可能相互理解和融通。我们所以这样说,还因为东西方文化并非是异质的,相反,它们具有同质的可能性。我们固然有必要认清东西方文化不同之处,但是,我们迄今所谈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其实都是文化现象的差异。即使人们孜孜以求的所谓“差异的根源”,也只是现象层面上的。现代结构主义启示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对不同文化本质结构共同性的探索。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前提是破译不同文化和文学现象内部相同或相似的本质结构,只有完成了这项实证性的总体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对话、交流、理解和融通。总之,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表现为跨文化阅读、阐发和接受的形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其内涵在异域读者的阅读和研究过程中随时代语境的变迁不断地被阐发出新的意义。翻译致力于对异域文化的再现,但阅读和接受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它们构建着异域文化的本土主体,这个“本土主体”既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所以,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不仅是为了繁荣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是为了

① L. A. Samova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 3.

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使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研究是一座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虹桥。

本书以整体论述和专题研究为主要形式,即先就一个研究领域开展整体论述,然后提供两个研究专题(笔者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示范,目的是使读者既了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的概貌和发展趋势,又能掌握研究的具体方法与策略。本书旨在通过展示中西两种文化立场,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这有利于读者形成较为全面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对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进行重新思考,使读者更新思维,拓展视野;通过专题研究的方法,使他们初步掌握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策略。

吴格非

2005年5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抑或中国文学？

——走向当代比较文学与解构主义双重语

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1

中西比较文学语境下的文学翻译研究专题（1）

从译介到接受——萨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13

中西比较文学语境下的文学翻译研究专题（2）

萨克雷及其作品在 20 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26

第二部分 中西文化的相互浸淫与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趋向

——作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实证—影响

研究下的文学翻译观 38

实证—影响研究专题（1）

萨特与中国新时期小说对人的“存在”探询 48

实证—影响研究专题（2）

劳伦斯对林语堂的影响研究刍议 63

第三部分 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

——谈比较文学的平行—对话研究 69

平行—对话研究专题（1）

自然、童心与诗——论英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童年

意识 74

平行—对话研究专题（2）

萨特与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88

第四部分 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的建构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阐发研究 99

跨文化阐发研究专题 (1)

萨特研究在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嬗变 104

跨文化阐发研究专题 (2)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述评 117

第五部分 世界文学研究中整体文化批评体系的建构

——比较文学与文化渊源研究 128

文化渊源研究专题 (1)

西方挽歌诗——兼与中国古代悼亡诗之比较 136

文化渊源研究专题 (2)

周立波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 145

后记 154

第一部分 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抑或中国文学？

——走向当代比较文学与解构主义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关于什么是文学翻译，正如关于什么是文学一样，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正如每个时代的文学工作者都必须重新思考文学理念并得出新的结论一样，每个时代的翻译工作者都必须不断重新思考文学翻译的概念，对其进行更为现代的诠释。文学翻译永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和终极的历史叙述。诚然，文学翻译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支脉，其基本特征总是表现为把外国文学作品从其母语转化为目的语的过程和结果。但这一过程和结果的存在状态究竟是什么呢？本章试图从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的双重语境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在外国文学翻译和中国文学创作之间架起一座互动的桥梁，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拓宽、重构我国当前文学翻译研究的视野和话语内涵。

一、外国文学概念的误区及其原因

长期以来，“外国文学”的概念在中国的文学学科领域担任着外文原著和外文原著的汉语译文之合二为一的角色。能指虽是一个，所指却是两个：外语研究界所说的外国文学是以母语形式存在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而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原著，通常是指外文著作的汉语译文。这无疑是一个所指的误区，它产生于人们长久以来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形成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想象，即译文应该完全忠实于原文，并在语言文化和阅读效果等方面均达到和外文原著对等的程度。该观念的谬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那就是中外文学创作与审美情趣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因

而不同文化之间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就永远不可避免。事实上,不仅跨文化误读是普遍现象,相同文化语境中的误读亦无处不在。当代解构主义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消解了文本的逻辑中心,从而使文本产生了无尽的意义,而每一种意义的产生,事实上都是对原文本又一次误读的结果。既然如此,建立于文本阅读和跨文化交流基础上的文学翻译,为什么一直执著于“信”或“对等”的教条呢?

人类对翻译的“信”和“对等”的追求,起源于古老的上帝信仰,因为人类早期的翻译活动是译“经”。欧洲的翻译活动始于把《圣经》从拉丁文转化成英、法、德等国语言。“《圣经》是上帝的言辞,不容作丝毫改变,因此必须对它采取字字忠实的翻译法。”^①于是,译者完全采用字对字的翻译法,对原文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不敢做任何改变,力求完全对等。其结果是,这种源于《圣经》翻译的“忠实”思想统治了欧洲数千年。尽管如此,欧洲的翻译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因为译文做不到‘精确’(accuracy)而被指责为‘邪恶’(evil)”。^②无独有偶,中国人最初翻译的外文典籍是佛经,译经乃皇帝圣谕,而且译者往往是虔诚的佛教徒,于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自然也理想化地追求译文和原文之间的“信”和“对等”的原则。然而,中国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理论,只是从近代以来接受了欧洲古典的翻译观念,后者至今主宰着我国的主流翻译思想;而在欧美文化界,19世纪末以后,哲学领域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宣布“上帝死了”,同时文学领域里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盛行,把“逻格斯”彻底排挤出了文学文本的范畴,西方的翻译观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20世纪初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开始致力于颠覆传统的翻译理论,他认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产生原词的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完全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③

① A. Lefever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47, No. 1, 1995.

② 同上。

③ 瓦尔特·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译:《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的确，基于模糊语言学的理论视角，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具有语义对等的功能，甚至一种语言中哪怕是最小的语言单位，要想在另外一种语言里寻到意义完全对应的部分，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堪称语言海洋的文学作品，当它被译成另一国文字后，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已是彼文而非此文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持这一观点，他指出：“从某种角度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新的历史。”^① 德里达认为译本是一部不同于原著的新书，这意味着，被翻译成另一国语言的外国文学著作，在该目的语国家已经失去了外国文学的身份。在中国，我们可以说，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不能称为外国文学作品。

二、翻译文学概念的进步及其局限性

被转换成他国语言的外国文学著作，一旦失去了外国文学的身份，它应该是什么呢？的确，外国文学的译本所处的位置十分尴尬：在中国，它既不适合被当作外国文学作品的原著加以研究和阅读（把译本冠以世界文学名著的头衔显然十分可笑），也没有被中国的民族文学所接纳（在译本还被冠以世界文学名著头衔的今天，读者显然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样一来，外国文学的译本事实上徘徊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边缘，生存于二者的夹缝中。国外有学者把译本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为“二等经典”（second classics），虽不确切，却也道出了其中酸楚。在我国，有学者也提出了较为类似的“翻译文学”的概念，并呼吁“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②，以试图改变译文的处境。

翻译文学无疑是一个进步的概念，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译学对“信”的刻板要求，对文学翻译中的增删、改写、叛逆、误译等现象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另一方面，它肯定了翻译家的创造性地位，并试图使译文具有和民族文学平等的地位。诚然，译者和作家身份不同，但作用相似。作家翻译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②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的是生活,译者翻译的是外文作品。作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进行创作,译者对外文原著进行揣测和解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用母语重新表达外文原著的内容和情感。由此,文学翻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翻译家的再创作,或者说,是翻译家用母语写作的产物。一部成功的文学翻译作品,没有理由不被视为译者母语写作的一次胜利。

但是,严格地说,把译文视为翻译文学也还不能真正给予其与民族文学同等的地位,因为翻译文学的作者依然是翻译家,作为翻译家,即使他把自己的翻译看作是再创作,他依然没有摆脱外文原著所在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他可以使自己的翻译语言比原文更优美,他可以删除、改写或转换不符合本国审美习惯的句子、段落和语言表达方式,但是,他所翻译出来的译文仍然要署上原著作家的名字,他仍然以一个译者的身份位居其后。因此,无论翻译家怎样翻译,他仍然是原著的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正因为如此,译文并没有在目的语国家取得独立的语言和文化身份。于是,我们有必要把翻译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就需把文学翻译行为纳入我国民族文学的活动范畴。

三、作为文学翻译延异形态的外国文学评论

本雅明认为,译文是“外语原著的再生”(afterlife on their originals)。他认为,没有经过翻译的文本不是活的文本。意思是,对于某一个国家的读者来说,如果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读过存在于外国的外语文学作品,那么这个外语文学作品对于这群读者来说毫无意义,就像死的文本一样。只有当这个外语作品被翻译过来并为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所阅读,它才是有生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者其实就是作品文本生命的赋予者。进而言之,翻译文本的诞生,就意味着外语原著的死亡,因为,既然读者是通过阅读译文去了解外语原著的,既然翻译根本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外语原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说,被翻译过来的文本其实就是原文?^① 本雅明的思维方式很特别,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翻译作品的崭新视角,提

① A. Lefever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47, No. 1, 1995.

出了文学翻译和外国原著关系的新理念。

要言之，本雅明把译文看作是原著的再生，实质上是对传统译学理论的一种解构。传统译学理论的重心是“译文—原著”的关系问题，在这一关系体系中，外文原著居于神圣的主宰地位，译文无论怎样只能是原著的附庸，仿佛离开了外文原著，译文便无法生存。而本雅明的翻译观宣告了外文原著的死亡，用译文代替了外文原著的地位，而一种外文原著的译文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意味着，翻译通过“折杀”原著，而不是通过“信”和“对等”的原则，取代了原著的地位，确立了译文的主体地位，从而给译文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此，我们可以说，译文之于原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过程，它是一个永不停止的生产和阐发过程。每一个阅读了外文原著的人，当他发表对该著作的看法时，他就开始了对原著的翻译。我们对原文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概念、每一个人物形象的阐释，对其中每一点意识形态的阐发，都是对原文本局部或整体的某种翻译，也是使原著不断复活的过程。这样，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字面的转换。如我们在翻译萨特的名言“the precedence of existence over essence”时，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它译成“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但是，当我们进行充分地阐释后，我们才会理解、发现其中的丰富内涵，它对于普通读者才有意义。因为今天去读萨特《存在与虚无》法文原著的人少之又少，况且对于只想了解萨特的人来说，无须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读萨特原著（以及“忠实”地翻译过来的译文），他们往往是阅读了关于萨特的研究或阐释性作品后才了解萨特学说的。由此，我们认为，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的阐释也是真正的和有价值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文学研究者就是一名翻译者，他们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阐释、评论文章都是对外国文学原著的翻译。于是，一部外国文学原著会产生无数的见仁见智的译文，它们从各个方面对原文进行不同的阐释，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这无疑使人想到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名观点：作者死了。作品产生伊始，作者就对它失去了控制权。文本不再有任何所谓的中心意义或终极意义，一切听凭读者的选择和阐释，读者是文本意义的创造者。

作为翻译的外国文学评论的意义还在于，它主要是从研究者本土文化

的视角对外国文学进行阐释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本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思考、研究和塑造异域文化。正如我国的许多评论家在论述“存在先于本质”的时候,所采用的观点其实已经完全背离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本意。但它们为什么能够为中国读者所认同和接受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评论家在其中灌注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把它塑造成了中华民族所能够接受的文化形态,从而使萨特式论点和我国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相结合。

作为外国文学评论形态的文学翻译的本质是接受,而不是忠实地表现外国文学原著的内涵。接受就是立足于我们的本土文化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在这过程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精神更多地被灌注其中。事实上,这种行动一直在进行着。很多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并不主要产生于传统的翻译文本,而是因为还有基于原文和传统译文的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更多链接的阐释作品的存在。弗洛伊德和萨特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靠外文原著,也不仅仅靠他们著作的种种译本,而是靠无数弗洛伊德和萨特的研究者。迄今,在中国有多少关于弗洛伊德和萨特的研究专著,有多少关于他们学术理论的教材,已经多得无法统计了。绝大多数读者对萨特和弗洛伊德的理解,就是从这许许多多的阐释性作品中得到的。这许许多多的阐释性作品,其实都是研究者对弗洛伊德和萨特的种种翻译,外文原著的生命就是依靠这无数的阐释意义上的翻译延续下去的。这种翻译永无止境,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翻译,不同时代需要对弗洛伊德和萨特的不同的理解,这样这种翻译才会进行下去。翻译是对一种思想学说的创新和发展。萨特就曾说过:“[我]发现有的教员讲解‘存在主义’,往往比我在《存在与虚无》中讲得好。这可能就是因为讲解的时候,人们必须有所创新,要了解新事物的缘故。其次,光阴荏苒也使哲学变得灵活了。”^①

总之,我们可以把外国文学评论视为文学翻译的一种延异形态,它有助于我们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译文有时在译入国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影

^① 雅克·桑赛尔:访让-保尔·萨特,《外国文学》,1980年第5期。